

## 主持人语

2018年以来，俄罗斯总统大选，普京再次获得连任；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向世界呈献了64场足球盛宴；俄美互怼，相互驱逐60名外交官；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俄美在中东大国博弈；卢布汇率面临巨大考验，俄乌之间又起争端……无论国内国际，未来俄罗斯将面对怎样的困境、机遇和挑战？它们与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10月19日举办了第十三期博雅工作坊，就“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基因”问题展开研讨。

工作坊邀请了来自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等学科领域的十余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以更为多元的视角、更加立体全面地观察俄罗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分析俄罗斯在当代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中的形象和地位，并通过对其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对其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反省，解读当代俄罗斯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历史照进现实，今天俄罗斯发展变化的每一步，与其历史与文化都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广阔的地理疆域和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贮藏地，同时是一个以饱经创伤来改变社会状态、改变集权主义的地方。东正教的精神和价值观在其民族性格中沉淀，成为一种固化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成为民族共性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对欧亚主义的执念，本质上是关于俄罗斯身份的地理构想，表达了俄罗

斯知识界某种模糊的渴望，渴望还原其昔日的帝国身份。双头鹰之意象，既表示其疆域和欲望纵横东西，也表示其性格和行事风格的极度矛盾和难以捉摸。费·丘特切夫曾说过，“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共同的标准不能把她丈量：她有特殊的身段，对俄罗斯我们只能信仰。”只有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了解它的性格与心态、了解它的思想与逻辑，才能真正了解当代俄罗斯。

云集于工作坊的各位专家学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力、深刻的学术见解，洞穿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基因，向我们展示了不同面向的俄罗斯，并与在场的年轻人分享智慧、互动交流，必将推动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宁琦

2018年12月8日

## “博雅工作坊”第13工作间

### 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基因

2018年10月19日

本期博雅工作坊由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主持。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承旦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者表示欢迎，他说，区域与国别研究是目前国内非常紧迫且必须开展的一个研究领域，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因相关研究仍处于弱势局面，尚无法与中国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相适应。北京大学于今年4月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希望通过这一平台，将分散在各院系、各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提升区域与国别研究水平。研究院目前承担着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智库功能及对外交流四项工作任务，在学术研究方面，通过定期举办博雅工作坊的形式，邀请国内外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主题进行集中研讨，本期主题“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和文化基因”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题目，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通过深入研讨，对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深刻的理解。

宁琦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举办以俄罗斯为主题的博雅工作坊，是希望能从更多视角、更加立体地观察俄罗斯，不仅仅是分析它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和文化解读当代俄罗斯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逻辑和历史轨迹，今天受邀参会的都是俄罗斯研究领域

的专家，希望各位能够用智慧播撒俄罗斯研究的种子，推动中国的俄罗斯研究实现全方位发展。

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李永全首先发言，题目是《欧亚伙伴关系——俄罗斯应对时局之策》。

李永全表示，目前世界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全球化进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本是全球化的发起者也是最大的获利者，现在却成了逆全球化的代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近期特朗普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对俄罗斯也进行制裁，甚至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发出威胁，声称在贸易领域美国是优先的，实际上这一做法是撕下了美国在全球鼓吹多年的，几乎让全世界尤其是年轻人都已相信的民主和自由的虚伪包装。美国并不是否定全球化，而是要求全球化规则要适合自己，他们认为目前全球化规则下的优惠条件已无法满足其胃口，所以才出现今天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都提出了应对方案，由此产生了今天要介绍的几个概念：“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和欧亚经济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全新理念、全新原则、全新方式的合作倡议，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开展务实合作，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主导的，原苏联空间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成果，也是美俄地缘政治博弈的重点地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 2015 年末提出的向东外交变化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是抵御美国和西方的攻势，最终实现强国梦；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是“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发展的对接点，处

理好这个对接关系有助于“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主要体现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方面。

欧亚经济联盟是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成果，这一进程中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是核心。布热津斯基曾在《大棋局》中指出，没有乌克兰，任何一体化的成果都只是亚洲而不是欧洲，所以俄美在该地区的博弈是非常激烈的，并且还将持续下去。对于“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倡议，欧亚经济联盟是实体，二者对接逻辑不通，此外，欧亚经济联盟是多国组成的经济体，俄罗斯在没有与其他成员商量的情况下与中国签订重要协议，也表明俄罗斯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今年 5 月，中俄就“一带一盟”对接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虽然协定没有实际约束力，但意义重大。首先，他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经贸合作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之上；其次，这是一项制度性安排，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合作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树立了良好的范式；三是该协定既考虑到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整体情况，也照顾到了双方合作的具体特点。

大欧亚伙伴关系是普京于 2015 年末提出的，目的是使俄罗斯在面对西方制裁和压力的情况下能够摆脱困境。虽然不是官方表态，但俄罗斯主要的智库指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目标是使俄罗斯成为欧亚地区尤其是北欧亚地区的强国，但最终还是要成为世界强国。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有四个目的，一是复兴进程的需要，二是国内发展的需要，三是远东发展的需要，四是应对“一带一路”的需要。大欧亚伙伴关系内

容涵盖政治、经贸、安全、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农业等领域，既有虚也有实，既然着眼于当代也面向未来。

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后的 2016 年 6 月，中俄签署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构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实际上就是指俄罗斯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其中既包括政治内容又包括经济内容。与俄罗斯支持一带一路相同，中国对大欧亚伙伴关系也持支持态度，并提出双方应重点加强经贸领域务实合作的建议，得到双方决策层的认可。在之后中俄签署的多项合作文件中，该领域合作的表述从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变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所以欧亚经济伙伴关系是“一带一路”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合作的对接点。

按照俄罗斯的思路，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需要吸收上合组织成员，欧亚经济联盟成员甚至东盟成员，但这一体系能够走多远是个问题。实际上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首先，大欧亚伙伴关系是俄罗斯主导的，不是不可逆的，一旦俄美欧关系出现重大转机，大欧亚伙伴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速度也将具有不确定性；其次，俄罗斯作为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倡议发起国和欧亚经济联盟倡议发起国之一，其经济结构、贸易结构和对外经济联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它的前进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第三，欧亚经济委员会目前权限有限，它是欧亚经济联盟的决策机构，对外谈判由其承担，但目前欧亚经济联盟授予它的权力只是对外搞贸易谈判，不能搞投资谈判，所以欧亚经济联盟如果作为整体和中国或任何其他地区合作，也将面临很大问题；第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务

实合作尚缺乏完善的机制，甚至缺乏共识，所以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还存在一些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冯玉军的发言题目是《俄罗斯战略文化与外交风格的当代传承》。

冯玉军表示，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话题，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非常重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性的。然而，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却相当肤浅，对于其历史、文化、外交战略等方面的认识还存在误解、曲解或是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很多人认为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可实际上他们打仗并不行，从第一次卫国战争到第二次卫国战争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克里米亚战争被英、法、奥斯曼土耳其联军击败，1904年俄日战争整个波罗地海舰队被日本消灭。但是，俄罗斯人是非常有谋略的民族，特别是在外交领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他认为，俄罗斯战略文化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不断的侵略扩张使领土越来越大，从而产生新的不安全感，新的不安全感又导致其进一步侵略扩张，这一循环一直没改变；二是俄罗斯处于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既是东方又是西方，既不是东方又不是西方，因而在其战略文化中有两个关键点，既要避免两线作战，又要试图从两面获利；三是作为一个帝国，俄罗斯历史上的侵略扩张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是不同的，后者建立的是间接统治，而俄罗斯人是大陆式的侵略扩张，是蚕食鲸吞式的真正殖民，他们的哥萨克军队走到哪里其移民就走到哪里；四是极高的谋略，俄罗斯有句古话：撕掉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就会看到一个鞑靼人，反映出俄罗

斯人吸收了东西方文化中相当多的正面和负面的内容。

冯玉军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罗斯外交方面的认知是非常到位的，他们写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助于后人理解俄罗斯人的对外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恩格斯曾经说过，对外政策无疑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的外交家曾使俄国的边界潮水般地向外扩张，其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近一千年来，俄国可以说形成了非常丰厚的外交传统，这种传统已经成为了俄国外交界的现代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目标，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用一切手段将俄罗斯帝国变成现在这般强大。

对于俄罗斯外交的特点，冯玉军总结了以下几点：第一，俄罗斯对外交的本质有清醒的理解，即外交是为了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它不仅是谈判桌上的你好我好，不仅是外交部发言人的义正辞严，还是勾心斗角，是桌面下的相互踩脚和你争我夺。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普京曾经说过，“我不要你们这些外交官天天给我写电报，分析国际局势，你们的工作就是出去跑人脉、拉关系以拓展俄罗斯的利益，改善俄罗斯的形象。”

第二，俄罗斯外交有大战略，它不仅考虑一时一事之得失，更加关注全局性的统筹与战略。比如俄日战争后的40年间，俄罗斯人在整个东亚的战略就是要报俄日战争之仇，期间它花费了大量的外交资源，最终借着二战胜利之机实现了目标，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在东亚地区的最大利益，并且



在这个阶段里将日本的侵略矛头转向了中国、南太平洋甚至美国。

第三，俄罗斯外交的根本内核是实用主义，只要能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它会迅速调转船头不惜改变以往的外交立场。19世纪初，俄国在欧洲外交上面临着与英国或法国战略结盟的选择，尽管它此前曾主导过第三、第四次反法联盟，但在1807年弗里德兰战役失败后它迅速调整了外交方针，和法国签署《提尔西特和约》，实现了从反法到联法的根本性转变。二战前，苏联在德意志法西斯和英法美之间做过艰难的选择，最终考虑到整个形势的变化，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既再次瓜分了波兰，又维护了自身的安全，同时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但之后形势的变化又使它作出了战略性调整。

第四，俄罗斯外交中非常重要的思想内核是弥赛亚思想，即救世思想。它往往会打着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大旗，在地区和世界范围内获得道义的力量，赢得一定支持者的拥护。今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当年在巴尔干俄国人就是打着保护斯拉夫兄弟、保护东正教教徒的旗号和英法展开大博弈的，最终打响了萨拉热窝的第一枪。十月革命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俄国人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了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世界革命，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维护了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今天俄罗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普京居然打着保守主义的旗号和特朗普、勒庞、欧尔班等人惺惺相惜，又引起了一股支持俄罗斯的浪潮。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人的外交从来都是要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要通过在其他国家

培植亲俄势力来维护自身利益，这种思想上的感召力不管对错与否，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第五，俄罗斯外交从来不钻牛角尖，善于围魏救赵，声东击西。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俄国人调头向东，利用中国面临的困难，与中国签署了《瑷珲条约》及《北京条约》，获得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出兵叙利亚，并在短短三年之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另外，俄罗斯人历来对其他国家没有信任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说过，“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那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和舰队。”这种天生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也决定了俄罗斯从来都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第六，俄罗斯外交善于利用矛盾制造冲突，转移矛盾借力打力，促使他国相互争夺以维护自身的安全并获得最大的利益，善于以居中调停的方式坐收渔利。恩格斯曾说过，“俄国外交总是在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做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外交善于利用其他强国的矛盾，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近代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压榨和侵略，俄国人非常好的利用了这一点，以冲突调停者的形象参与到中国的对外活动中，获得极大利益。

第七，俄罗斯的力量不在于其强大而在于其虚弱。俄罗斯外交不善于守成，而善于出其不意反败为胜。一战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均遭解体，但很快俄国人用共产主义的旗号，用共产国际的平台迅速恢复甚至扩展

了其全球性的战略构想。

第八，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的高度整合决定了它外交行动的高效率。俄罗斯外交从来不是单一部门性的工作，而是外交、情报、军事、宣传和人脉关系不同手段的综合性的运用。此外，俄罗斯外交善于用人，敢于用人，甚至利用外族人为俄国、为苏联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尽管新俄罗斯独立不过 28 年时间，但是千年以来特别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外交传统仍将继续深刻地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思想和外交行为，这是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候需要深刻认识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凤林围绕《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话语的两个含义》主题进行发言，内容包括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表现，当代民族主义的三种形态，俄罗斯理论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讨论的文本，俄罗斯种族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区别五个部分。

从历史表现看，俄罗斯民族主义问题是广泛涉及于俄罗斯历史、文化、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的社会现象和复杂问题，在俄罗斯历史上曾多次成为焦点，有以下几次突出表现：一是 16 世纪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弥赛亚主义，包括莫斯科罗斯是第三罗马的概念，这是从东正教神学历史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俄罗斯民族世界历史使命的问题；二是 19 世纪围绕斯拉夫主义展开的，是关于斯拉夫文化优越性以及全人类价值的问题，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三是 20 世纪初在一些报纸及相关刊物上出现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当时的焦点是关于民族情感、爱国情感和普遍的道德义务、规范两者关系的问题，争论点在于是民族情感压倒普遍道德规范

还是服从这种规范；四是 20 世纪上半期在俄罗斯哲学领域、政治领域中对于相关的概念的讨论。

当代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俄罗斯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形态：一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成为俄罗斯某些政党的主导思想或是意识形态，目前俄罗斯国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多个政党都有这种倾向；二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成为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三是民族主义成为学术讨论的理论问题。三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密切，表现为政治运动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舆论和理论基础，同时国家政治诉求也是社会关注和学术讨论的动因。民族主义受到当代俄罗斯的关注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是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力图寻求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政治完善的国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其次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周边的独联体内部都面临复杂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也都和民族主义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三是俄罗斯要在当代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交流中确立自己的形象和地位，这也涉及到民族主义的一些问题。

对于存在于三种形态及学术讨论中使用的“民族主义”，徐凤林认为，正确认识该词中包含的两种含义，有助于中国学者观察和研究俄罗斯民族主义现象及其多种表现形态。

第一种含义可以称为种族民族主义，这一含义与该词的词源 Nation 有关。Nation 的含义在近代西方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发生过变化，最初指种族、族群，因此 Nationalism 最初的含义是指种族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也即通常意义上的民

族主义。后来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建立了民族国家，也用 Nation 这个词，所以 Nation 也有了国家的含义，Nationalism 在西方近代语境中有了新的含义即国家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民族主义在西方语言中使用较少，而是用 Ethnicism 代替。在俄语的文献中也有相对应的词，但它的含义并不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而是多神教，因此 Nationalism 在俄语中没有像西方语言中那样发生意义转换，这也意味着由于在俄罗斯语境下没有对种族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进行划分，Nationalism 在大众话语中往往仍指传统意义上的种族民族主义的含义。因此，在很多情况下，Nationalism 被当作消极、狭隘的话语，将它和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反犹主义等概念相提并论，影响了一些学者和大众对俄罗斯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行情感中立的讨论。

第二种含义是更加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个意义上的 Nationalism 是和民族国家、国家建设联系到一起的，是指国家民族主义或者公民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性或现代化具有关联性，民族主义也由此成为俄罗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思想或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这个含义上的民族主义问题俄罗斯学者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国家民族主义应作为当代俄罗斯巩固和重建国家统一和完善性的思想基础，强调国家民族主义的主导思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运用汤因比文化生存发展中的挑战和应战的概念，认为从外部看，国家民族主义因带有负面含义，似乎是对其他国家的挑战，容易引发争论。但从国内来看，国家民

族主义不是挑战而是应战，因为在后苏维埃的俄罗斯尽管在形式上保留了领土完整，但社会的完整性正在消失，社会走向瓦解已是一种趋势，而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对社会瓦解的一种回应，它能为社会成员相互团结提供牢固的基础，是重建俄罗斯国家社会完整性的唯一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民族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计划的长期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可以划分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国家民族主义，其任务是在文化上重建国家民族主义形态；二是政治的国家民族主义，其任务是用自己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人民的利益，把人民作为国家政治的对象。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条件下诉诸国家民族主义思想是无益而有害的，如果把俄罗斯国家民族问题作为主义问题提出来，是不能促进文化民族国家认同形成的，而只能为俄罗斯的进一步分裂创造条件。他们认为建立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恒久帝国是不存在的，这只能是一种宗教观念或是建立在文明传播使命基础上的观念，企图给民族主义的闲谈赋予现实的政治意义，其结果不是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而是造成现有的俄罗斯国家的分裂。国家民族主义的现代相关性应在于政治过程的民主化思想。俄罗斯国家民族问题的健康提法是在俄罗斯现有宪法框架内实现法律秩序，即政治过程的民主化和联邦关系的规范化，实现宪法宣布的公民自由、保证国民履行义务所需要的条件，但实际上现代俄罗斯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纲领，它的实现却导致了现有权力体系的加强，使其走向非政治化和反民主化，民族动员可能成为对业已形成的政权体系说“是”的工具。民族主义者在与特权政治体制打交道的时

候，不是作为国家民主思想的保护者，而是成为国家体制转向专制制度的催化剂。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是以不同的政治立场为前提的，因此国家民族主义的含义是建立在不同政治立场前提上的，有保守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也有自由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还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民族主义，从不同政党的主导思想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民族主义。简而言之，当代俄罗斯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非常宽泛，在做相关研究时要对这一术语进行区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有以《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为题，从经济角度梳理了俄罗斯的区域战略演变。

张国有表示，俄罗斯具有帝国的传统和基因，它需要集团性的伙伴，从 1917 年之前的俄罗斯帝国到苏联再到之后的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一路演变而来。尽管初期的俄罗斯经济情况比较糟，但在 2010 年后它发展的非常快，是金砖国家中发展较好的，此后因乌克兰危机遭到美国制裁，但近两年又呈现出复苏的趋势，总体发展质量较好。

普京希望在独联体的基础上搞一体化，通过集团性伙伴的结构在世界上立足，所以一开始他在经济方面建立了关税同盟，希望成员国之间可以在关税方面提供优惠，后来又逐渐发展出欧亚共同体，以便各成员国能够拓展自身的经济利益。到了 2011 年，在新关税同盟条约签订后，一系列有关关税优惠的措施开始实施，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统一经济空间的概念，2014 年普京提出要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即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并于 2015 年初实施。有分析称目前普京

的“五步走”战略已经到了第四步，未来按照他的想法是要建立欧盟式的区域一体化。

目前，欧亚经济联盟覆盖了 1.8 亿人口，GDP 总量达到 4.5 万亿美元。普京曾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对前苏联地区相关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条件成熟，欧亚经济联盟将向欧亚联盟转化，统一市场、海关、货币、中央银行、共同防务等等。普京非常看重欧亚经济联盟，他认为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超国家联盟模式，可以成为当代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一共有 5 个，其中俄罗斯最强，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次之，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最弱。成员之间互补优势较弱，相互间贸易往来多数在矿产品、机械制造、食品农产品、金属和金属制品等领域，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如美国、中国、欧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欧亚经济联盟成立后有观点认为它是要恢复曾经的苏联，这也是美国、欧盟一直持有的观点；还有分析称它偏离了最初的设想，当初各国只是希望在经济方面加强交往，互利互惠，但俄罗斯却希望在经济一体化之外向政治和外交方向发展，争取成为欧盟式的有更大话语权的组织，但目前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乌克兰的加入存在很大的困难，其次，对于成员国希望从联盟中得到更多实惠的想法，俄罗斯必须拿出更多的物力财力帮助其他成员国，否则会降低组织动员力，第三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年纪较大，一旦领导人更替，新的领导人是否支持欧亚经济联盟存在不确定性。另外，包括美国、欧盟及一些亚洲国家等外部力量



对欧亚经济联盟的一体化战略也十分警惕。

在与欧亚经济联盟合作方面，中国目前是通过“一带一路”与其对接。但如同修建跨国铁路一样，如果不同国家的轨距标准不能统一，铁路就无法实现对接。对于如何对接的问题，俄罗斯驻华大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并提出几方面的建议，包括在金融投资、交通、经济合作区等领域特别是战略领域加强协调，实现对接。具体措施有建立中俄投资基金，加强两国油气能源合作，加强两国地方合作，共同推进欧亚大通道建设等。

张国有认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是中美俄三国长久竞争与合作的一个表现方面。正是由于中美俄三个大国有着不同的文化基因，国内长期主导的理念、规则、习惯和传统也不同，未来三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会持续下去，但从目前情况看，今后一、二十年中国还是应与俄罗斯联合，以解决各自发展进程中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在上午时段最后发言，题目为《中国视阈下的俄罗斯研究》。

张树华认为，研究俄罗斯对中国很重要，从国际上看，俄罗斯是继承原苏联的超级大国，在当今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敢于和美国霸权叫板，其外交实力、经验不容小觑。中俄是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科学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经验对于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近 30 年来俄罗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中国学习，对于中国走好改革开放之路，树立四个自信都有重要意义。

张树华认为，近 30 年来西方对俄罗斯做出的历史终结的判断是错误的，正是由于西方这些年来轻视、敌视俄罗斯，引发了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强烈反弹，打破了西方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统世界”的希望，这一结果也引发了西方政治界、学术界的反思。西方轻视、敌视俄罗斯的原因很多，包括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固守冷战思维，也包括受深层次西方中心主义等文化基因的影响。

张树华表示，以苏共为代表的原苏联东欧地区共产党的兴衰史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军队不在党的领导之下，最后苏共作鸟兽散，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国家解体、政权更迭和制度更替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一场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为标志的激进变革迅速席卷俄罗斯大地，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几年间，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财团、寡头参政局面出现。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更多出自政治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法律准备严重不足；追求速度和规模，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较好甚至是最好的部分；权钱交易突出，社会后果十分严重。

未来俄罗斯向何处去？张树华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也

是在讨论未来世界向何处去。当前世界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大多数人认为是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给全球带来了麻烦和问题，但有美国学者认为，相较于特朗普，美国全球实力的衰落和民主的长期失败、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才是给全球秩序带来威胁的重要原因。去年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质疑不断增强，甚至用经济学术语“做空”西方民主，一些民意调查也称西方青年已经对西方民主丧失了信心。福山也曾指出，对美国世界地位造成威胁的，正是美国政治制度自身的衰败。张树华表示，美国和西方的政治衰败，是造成当今世界的乱源。

在下午发言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百春围绕《俄罗斯人的两大天赋：交往与可塑性》主题进行阐述，包括两大天赋提出的背景，交往与可塑性的具体内容及中俄文化的等内容。

张百春表示，从公元 988 年引进东正教，直到 19 世纪俄罗斯文化领域几乎没有任何建树，然而在 19 世纪后的百年之间其文化成果却呈井喷式发展，这背后的动力就是其具有的交往和可塑性两大天赋。在俄罗斯学者看来，这两个概念是俄罗斯人独特的哲学体系中的内容。

交往是任何人之间普通的往来，但俄罗斯人的交往却不同，他们追求心灵上和精神上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存在着对人塑造的作用。整个 19 世纪俄罗斯文化人之间的交往达到疯狂的状态，比如普希金，他曾在莫斯科各种沙龙中发表诗作，在与其他诗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灵感。关于可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次纪念普希金的会议上曾说，

‘普希金年轻时一直在模仿拜伦，但并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在模仿的过程中激发自我，最后塑造出了普希金’，这就是俄罗斯人第二个天赋即可塑性。俄罗斯民族文化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被塑造的过程，当俄罗斯人 19 世纪登上历史舞台时，西方文化已经成熟了，面对成熟的文化，俄罗斯没有机械地模仿，而是利用这个文化塑造自我，这也是俄罗斯文化的成功之处，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

对于中俄文化交往，张百春认为，尽管苏联最终被瓦解，但俄罗斯文化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被忘记，而是引发世界的关注。俄罗斯处在欧亚交界，其文化是连接东西方的桥梁，特别在哲学方面，俄罗斯哲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西方哲学回应的基础上，这对于中国的哲学研究很有价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关海庭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和前苏联（俄罗斯）央地事权关系比较研究》。

关海庭表示，苏联是高度集权国家，长期的思想僵化导致特权阶层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官僚特权，企业特权，地方特权，这些特权阶层对改革形成了阻碍，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

俄罗斯央地关系改革的背景是高度僵化，社会动荡，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他曾鼓励一些大的自治共和国独立，如曾在喀山对鞑靼人说，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去多少，但实际上叶利钦在央地关系方面是功大于过的，主要做了三件事，且都较为成功：一是绝大多数共和国都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条约，这也是今天俄罗斯存在的基础；二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其作用随着国家的发展日益显露；三是规范了央地关

系，其中 1995 年通过预算法，规定中央预算占 54%，地方预算占 46%。普京时期也推出了系列举措，比如设立联邦区，修改议会上院组成原则，修改政党法，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改变地方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改变直接选举制，候选人由总统提名，由地方议会产生，将干部任命权抓在中央手中。到了梅德韦杰夫时期，恢复了直接选举地方领导人制度，但提名权由总统与各政党协商产生。2012 年以来，最大的变化是地方领导人可以普选，可以由议会选举，但总统始终保留了提名权。总体上看，俄罗斯央地改革呈现向好趋势，新的央地格局已经形成，地方权限较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对于中俄央地关系的比较，关海庭认为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中俄改革总的原则的比较，在这方面俄罗斯主要是一些教训。央地关系涉及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俄罗斯改革初期速度快，波动性大，实际上渐进性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第二是中俄央地政治关系的比较。目前经过调整的俄罗斯基本上步入了正轨，在地方领导人选举上，提名权是总统认可，议会信任，双方都有这个权力；第三是中俄央地事权关系的比较。俄罗斯是联邦中央、联邦主体、联邦地方三级，在事权上比较规范，每级政权都有预算权和税收立法权，税收也分为联邦税，联邦主体税和地方税三层。中国是五级行政体制，四级财政体制，一级税收体制，税收立法权完全在中央；第四是中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比较，在这一点上中俄非常相像，但俄罗斯相对做的更好，拉平前后的差距在缩小；第五是中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范围的比较。俄罗斯对落后地区的支持联邦税有 16 种，联邦主体税 7 种，地方税 5

种，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后的限制非常清晰，包括落后地区严格控制标准，向民生倾斜。中国的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则过于笼统，平均为五五开，比如某城市财政收入是 100 亿，国家给它的转移支付是 100 亿，整个支出就是 200 亿。发达地区是七三开，即地方财政收入占支出 7 成，国家转移支付占 3 成，落后地区大概为四六开即地方财政收入占支出的 4 成，国家转移支付占 6 成。比例上中俄大体相当，但在资金的使用上俄罗斯相比更规范一些。

关海庭指出，俄罗斯央地关系改革有几方面经验可供中国借鉴。一是从政策导向向法律为主政策为辅的导向转变。目前中国央地关系主要靠政策，相关的基本法律不太健全，俄罗斯央地关系则主要以其宪法中的规定为准；另外，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共管的事务较少，中国则较多。在共管方式上，俄罗斯“并联”管理（分级管理）的事务多，“串联”管理（不同阶段介入）的事务少，中国则是“并联”和“串联”的事务都很多。在管理方式上，中国应从“串联”向“并联”逐渐转变。二是以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为切入点，构建中央服务于地方的完善体系。俄罗斯对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比较规范，划分了三种资金，一是落后地区援助资金，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三是帮助地区平衡预算的资金，目前看使用效果很好。中国基本上是税收返还，服务于地方方面并不很规范，可以借鉴俄罗斯相关经验。三是以权责一致为原则，建立支出同责任相统一的制度。中国目前在事权刚性支出上中央占 15%，地方占 85%，地方事权太多，但相当多的事权没有财政配套，由此会引发地方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

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建立以责任为核心的制度框架，适当调整央地税收划分比例，完善中期预算制度。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杨成的发言题目是《俄罗斯政商关系的路径依赖：基于权力-财产权的分析》。

杨成表示，很多人在讨论俄罗斯时经常会认为俄罗斯不可认知，但如果将观察的时间段拉的足够长，对历史的细节掌握的足够多，那种丘吉尔所称的“谜中之谜”是可以被解开的。

从财产权来看，俄罗斯历史上是没有财产权的。早在基辅罗斯时期，他们获得利益的手段主要是与拜占庭的贸易，相当于基辅的大公成立了一家公司，请了一帮博雅尔贵族和商人加入成为股东，集体分红，所以在那个时期，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通过协商的方式从贸易中获取利益，因此没有分权的必要，也不会和土地挂钩，原始上就没有财产权的概念。之后基辅罗斯开始衰落，东北罗斯开始兴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继承制度慢慢形成，并且逐渐走向长子继承制。与基辅罗斯靠贸易不同，东北罗斯发展贸易面临的空间越来越窄，因此必须依靠土地，土地与继承制度结合后就产生了领地意识，但这种意识仍是集体公共产品的意识。伊凡三世时期，蒙古入侵俄国，莫斯科公国皇宫贵族开始替蒙古贵族收税，与之相关的制度逐步得到完善。随着历史的演化，权力逐渐凌驾于财产权之上，最终与权力形成捆绑，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财产权。

权力与财产的关系在沙俄时期如此，到了苏联时期也一

样，苏联解体后，尽管在 90 年代混乱时期这一现象出现了新变化的可能，但普京执政后又回到了历史传统的路径上，尽管此后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被欧美认同，但这种认同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俄罗斯的经济体系真正符合市场经济的规范，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意识则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对市场经济意识思维方式的不同，成为中俄经济合作效果不好的一个原因，也导致目前俄罗斯在开展经济合作时总是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影响。

杨成认为，普京在上世纪 90 年代拨乱反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能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发扬光大，在俄罗斯国内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较好的营商环境，而仅仅依靠过去的动员模式，就无法出现企业家希望的那种稳定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环境。俄罗斯的政商关系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可能无法有力应对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因此对于俄罗斯的前景较为悲观。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建华以《从文化史到文化学：当代俄罗斯学术转型的热点与问题》为主题进行发言。

据张建华介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历了学术的转型，这种转型是从一切贯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哲学向另外一种新的学术转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被抛弃后，俄罗斯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史学危机，哲学贫困，文学堕落等等。在转型过程中史学范围出现了两个最明显的亮点，一个亮点是文化史，各个大学的历史系纷纷建立俄罗斯文化史的教研室，和文化史相关的研究成果、论文著作、小册子、教科书层出不穷，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彼得堡分



所的米罗诺夫院士出版的《俄国社会史》，其副标题名为《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这些名词用在沙皇俄国身上似乎并不协调，但它就是用文化史加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 18 至 20 世纪的俄国历史重新梳理一番，表明俄国是有人性、有个性的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另外一个亮点是文化学，各个大学、研究所纷纷建立文化学的研究机构，开始出版文化学杂志。1995 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首次制定了经过大学五年学习取得文化学专业学位的标准，设立了文化学副博士学位，2000 年又设立了文化学博士学位。文化学是俄罗斯一个比较新的专业，研究内容包括俄罗斯文明与世界文明，性别与婚姻，民族性与国家性，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族冲突、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普世主义等，而文化史研究内容则包括庄园史、风俗史、贵族生活史、决斗史、首都史，外省文化史、婚俗史、城市生活史等等。

张建华表示，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俄罗斯学的角度或是历史学的角度，他们在研究俄罗斯历史文化时使用的“武器”是文明史观，从这个角度看待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与东西方关系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抛弃后，俄罗斯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始终被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走东方道路还是西方道路或斯拉夫道路的问题所困扰，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要给转型的俄罗斯重新定位。自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将东正教文明归于另类后，俄罗斯迫切希望证明其自身是有文明和文明史观的。此外，俄罗斯

要在外交上进行重新定位也是重要的背景因素。

目前来看，俄罗斯文化史和文化学的风潮并不是一时的，并且这两方面的研究视角也被很多人所吸收，比如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学院士阿里科萨耶夫用技术文明取代俄罗斯田园诗般的传统文明，另外，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巴赫金热，将作为语言学家的巴赫金看成是新文化的代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史学界出现了语言文化学的转向，当时苏联跟西方在政治上是冷战，军事上是冷战，学术上是没有交流的，但在此之后语言文化转向却蔚然成风，这些因素叠加使得文化史和文化学两个学科在俄罗斯仍然非常有市场。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并没有文化语言学、交际语言学那么兴盛，这其中似乎也有文化学、文明学、文化史观的因素在起作用。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教授赵桂莲当天最后一个发言，主题是《古代俄罗斯文献中蕴含的俄罗斯文化基因》。

赵桂莲表示，对俄国认识特别精辟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还有俾斯麦。他在彼得堡做外交官时有次外出打猎，一个俄国马车夫跟着他，回程遭遇暴风雪找不着路，刚到俄国的俾斯麦不会说俄语，马车夫更是不懂一句德语，在俾斯麦越发无助的时候，马车夫却一直在说“没关系，我们会走出去的”，最后两人安全脱险，俾斯麦别的没有记住，只记住了“没关系”这一个俄语单词。罗赞诺夫曾写过一篇名为《围绕俄罗斯理念》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主要研究了俄国的文化特征，他说，“这样一个德国人在俄国马车夫的人生当中应该留不下任何的痕迹，可是这个俄国马车夫在俾斯麦的

生命历程中却一定会留下深刻印象。俾斯麦后来曾表示过永远不要跟俄国人作战，永远不要挑起与俄国人的战争，因为你是战胜不了他的。”

罗赞诺夫认为俄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阴柔性，就像一个家庭，俄国是新娘，外来的文化元素是阳刚的丈夫，妻子放弃的越多，对丈夫的控制却越强，在这其中起真正作用的不是妻子的任性或随心所欲，而恰恰是自己无怨无悔的完全奉献。罗赞诺夫说俄国无限的放弃自己，接纳了外来文化，最后将其消化在俄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罗赞诺夫总结了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俄国是以人与人之间和谐为开端而建立起的，人际关系是信任，西方则是以阶层、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为开端建立起的合同制、议会制、契约制；俄国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遵循的是道德观念，西方所依据的则是理性和理智；俄国人在交往的过程中更在意爱、怜悯、同情，西方人遵循的则是戒律、规范条例等规制性的东西。

赵桂莲认为，俄国在 19 世纪后的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果源于其古代以来的文化基因，而这些基因在很多经典文献文本中都有体现。比如 1037 年俄国宗教的最高领袖伊拉里昂发表的一篇演讲《法于恩惠说》，其中“法”是旧约天主教的精神，爱是新约的精神，《法于恩惠说》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就是基督教西方和基督教东方的对立。俄国的最高宗教领袖第一个发表了这样的演讲，也为俄国与西方的对立提供了一个依据。另外该文本有一半的篇幅在讴歌最高世俗领袖，最高宗教领

袖讴歌最高世俗领袖，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莫斯科第三罗马不是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横空出世的，在《法于恩惠说》中就已有非常鲜明的呈现。

第二个文本是 13 世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留下的训诫。莫诺马赫戎马一生，在临死前留下的文本却是告诉孩子战胜敌人需要靠三件事：忏悔、眼泪、仁慈。忏悔、眼泪都是给予自身的，要保持一颗柔软的心，要保持有流泪的能力，而仁慈是给予他人的。这些都成为了影响俄罗文化底色的元素。

第三个文本是 17 世纪关于酒鬼的故事。故事中的酒鬼每天喝很多酒，但每喝一杯酒都要赞美上帝，每天夜里都要长时间的祷告，后来天使将他带到天堂门口，他敲了 6 次门，出来的分别是彼得、保罗、大卫、所罗门、尼古拉和约翰，他们说酒鬼不能进天堂，但酒鬼说，“你们每个人都是有瑕疵的，有什么资格判断我，你们只是从表面上说我是酒鬼，不能进天堂，但你们知道我每喝一杯都在赞美上帝，每夜都在忏悔自己的罪过吗？你们不知道却不让我进天堂。”这个故事虽简短，却反映出俄国人“在不知道事实的情况下不随便去论断他人”的朴素价值观念。

会议最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外国语学院院长宁琦进行总结，她表示，通过各位专家一整天的发言和讨论，大家能够全方位多角度更好地观察和了解俄罗斯。研究院举办工作坊不仅仅是希望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能够产生智慧的“碰撞”，更是希望这些“碰撞”能够给青年学者们带来启发，期待今天的会议能给俄罗斯相关研究做出更多学术贡献。